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史记》与中国文学

(增订版)

张新科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史记》与中国文学

(增订版)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与中国文学/张新科著. —增订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ISBN 978 - 7 - 100 - 07191 - 8

I. 史… II. 张… III. 史记—文学研究
IV. ①K204.2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8507 号

国家“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史记》与中国文学

(增订版)

张新科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7191 - 8

2010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 1/4

定价:28.00 元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编委会

顾问：霍松林

主编：张新科 李西建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歌东	尤西林	冯文楼	邢向东
李继凯	刘生良	刘锋焘	李 强
吴言生	张学忠	杨恩成	赵望秦
赵学勇	胡安顺	党怀兴	高一农
高益荣	曾志华	程世和	傅功振
傅绍良	霍有明	魏耕原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工作委员会

顾 问：霍松林

主 任：李西建 张新科

委 员：邢向东 赵望秦 霍有明 刘锋焘

赵学勇 李继凯 尤西林

王 宁 袁 行 吴 昊 李 建

王 岳 李 建 王 岳 李 建

王 岳 李 建 王 岳 李 建

王 岳 李 建 王 岳 李 建

王 岳 李 建 王 岳 李 建

总 序

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都市,先后有 13 个王朝建都于此,绵延 1100 余年,形成了辉煌灿烂的长安文化。长安文化具有多种特性。首先,它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以长安和周边地区为核心,以黄土为自然生存环境,以雄阔刚健、厚重质朴为其主要风貌,这种文化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富有强大的生命力。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陕军”、中国艺术的“长安画派”等,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可以称之为“后长安时代”的文化。其次,它是一种相容并包的都城文化,既善于自我创造,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又广泛吸纳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化,也善于吸纳民间文化,形成多元化的特点。复次,它是中国历史鼎盛时期的盛世文化,尤其是周秦汉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其所产生的文化以及对外的文化交流,代表了华夏民族的盛世记忆,不仅泽被神州,而且惠及海外。第四,它是历史时期全国的主流文化。由于长安是历史上许多王朝的都城,是当时政治文化的中心所在,以长安为核心形成的思想、文化,辐射到全国各地。第五,它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产生于中国历史的早期,是中国文化之根,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II 《史记》与中国文学

对长安文化进行研究,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更有了新的起色,尤其是“长安学”、“西安学”的提出,为长安文化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并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陕西师范大学地处古都长安,研究长安文化是学术团队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深入挖掘长安文化的内在价值,探讨长安文化在中国文化、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借国家“211工程”三期建设重点学科之机,以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为龙头,全面整合文学院学术力量,申报了“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项目,获得国家教育部的支持。本项目的研究,一方面是要发挥地域文化的优势,进一步推动长安文化的研究,并且为当代新文化建设贡献力量;另一方面也为研究中国文学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使文学研究有坚实的文化根基。这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尝试,我们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向:

第一,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演变

立足文学本位,充分发挥地理优势,以长安文化为背景,对中国文学进行系统研究。

1.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精神。主要研究长安文化的内涵、产生、发展、特征以及对中国文学精神所产生的影响。
2. 汉唐文学研究。主要研究长安文化形成时期以《史记》和汉赋为代表的盛世文化的典型特征以及对后来长安文化的奠基作用,研究唐代作家作品、唐代文化与文学、唐代政治与文学等,探讨汉唐时期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
3. 汉唐文学的域外传播。主要对汉唐文学在域外的传播、汉唐文学对域外文化的影响、长安文化对域外文化的接受等问题进行全面研究。
4. 古今文学演变。以长

安文化为切入点,探讨长安文化辐射下“后长安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以及陕西文学的内在演变。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长安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内涵。本项目首先需要从不同的层面对长安文化进行理论总结和阐释,探讨长安文化对中国文学精神的渗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长安文化对中国文学演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汉唐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转折期,也是长安文化产生、发展乃至鼎盛的重要时期。所谓“汉唐雄风”、“盛唐气象”就是对这个时期文学的高度概括。不仅如此,汉唐文学流播海外,对日、韩等汉语文化圈国家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域外传播,可以从新的角度认识汉唐文学及长安文化的价值意义。今天的古城长安(西安)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形成新的文化特征。通过古今文学演变研究,探讨、总结中国文学和陕西文学的发展规律,进而为长安学(或西安学)的研究奠定良好基础。

第二,长安与西北文化

立足于长安文化,突出地域文化特色。主要有:1. 西北重点方言研究。关中方言从汉代开始即对西北地区产生辐射作用,这种作用在唐代以后持续不断,明清两代更有加强。因此,西北方言与关中方言的关系极其密切。从古代直到现代,西北的汉语方言与藏语、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发生接触,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异。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我们的任务之一。2. 秦腔与西北戏曲研究。在长安文化的大视野下研究长安文化对秦腔及西北戏曲形成发展的影响;同时以秦腔及西北戏曲为载体,研究

IV 《史记》与中国文学

戏曲对传播长安文化所起的作用,从而显现长安文化在西北民族文化精神铸造中的巨大作用。3. 西北民俗艺术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主要研究西北民俗文化特征、形态以及对精英文化的影响,研究如何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并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加强西北地区代表性方言的研究,对西北方言史、官话发展流变史、语言接触理论研究等,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秦腔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号称中国梆子戏家族的鼻祖,是长安文化的活化石。秦腔诞生于陕西,孕育于秦汉,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末清初,受到西北五省(区)人民的喜爱,已经入选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西北民俗的中心在陕西,陕西民俗文化是西北民俗文化的发源和辐射中心地。陕西民俗文化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形式,对社会个体和整个社会都有重要意义。同时,陕西曾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之一,作为最早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点,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方面。对于这些遗产的整理、保护以及利用,不仅可以加速社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也可以构建和完善中国文化的完整性。

第三,长安文化经典文献整理与研究

对长安文化经典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主要内容有:1. “十三经”的整理与研究。主要完成《十三经辞典》的编纂任务。之后,再进一步进行“十三经”的解读与综合研究,探讨经典文化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2. 与长安文化有关的文学文

献整理与研究。本项目拟对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的古代文学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如重要作家的诗文集等),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十三经”与长安文化关系密切,保存了先秦时期的重要文献,尤其是《诗》、《书》、《礼》、《易》几部经典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属于以丰镐为都城的西周王朝的官方文献。“十三经”既是早期长安文化的标志性成果,也是秦汉以来长安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内容涉及古代文化的许多方面,诸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民为本的治国原则、和谐人际的伦理主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重视德操的修身境界等等。这些思想、精神渗透在民族的性格与心理之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另外,长安文化形成时期,产生了许多经典文献,经、史、子、集均有保存。许多文人出生于长安,或游宦到长安,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对长安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是研究长安文化的基础,需要进行细致的整理。

围绕以上三个方向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对长安文化进行较全面的认识,尤其是对长安文化影响中国文学的诸多问题有开拓性的认识。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三秦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拟把研究成果以不同的丛书形式出版,目前已启动的有《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长安文献资料丛书》、《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等。《十三经辞典》已经出版十卷,我们将抓紧时间完成其余工作,使其成为完璧。总之,通过“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项目的实施,我

们要在学术上创出新特色,在队伍上培养出新人才,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同时也为国家与地方文化建设及文化遗产保护做出一定的贡献。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工作委员会

2009年11月22日

目 录

导论 关于《史记》文学特质的思考	(1)
第一节 思考《史记》文学特质应确立的原则	(1)
第二节 《史记》的文学特质	(5)
第一章 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及其影响	(12)
第一节 对前代文学思想的继承	(12)
第二节 司马迁的文学观	(17)
第三节 处在儒学文艺思潮盛行时期的司马迁	(27)
第四节 司马迁文学思想的影响	(37)
第二章 《史记》与中国古典散文	(44)
第一节 集先秦散文之大成	(44)
第二节 《史记》散文的新成就	(49)
第三节 千秋宗匠 不朽典范	(64)
第三章 《史记》与中国古典传记	(71)
第一节 《史记》以前传记的发展	(71)
第二节 《史记》对中国古典传记的贡献	(82)
第三节 《史记》对中国古典传记的影响	(103)
第四章 《史记》与中国古典小说	(111)
第一节 《史记》与古代小说的渊源关系	(111)

II 《史记》与中国文学

第二节 形象化的人生	(118)
第三节 立体化的叙法	(123)
第四节 戏剧化的场面	(126)
第五节 小说对《史记》艺术的发展	(130)
第六节 《史记》与古代戏曲	(134)
第五章 《史记》与中国抒情文学	(137)
第一节 《史记》是一部宏伟的史诗	(137)
第二节 司马迁的史诗与杜甫的诗史	(162)
第三节 《史记》与中国抒情文学	(168)
第六章 《史记》与中国古典悲剧	(171)
第一节 《史记》悲剧的范畴与类型	(171)
第二节 《史记》的悲剧精神与悲剧效果	(175)
第三节 《史记》的悲剧艺术与结构特征	(180)
第四节 司马迁的悲剧心态与悲剧时代	(184)
第五节 《史记》与中国古典悲剧	(192)
第七章 《史记》与中国浪漫主义文学	(195)
第一节 “戴着镣铐跳舞”——实录基础上的想象	(195)
第二节 司马迁“爱奇”的倾向	(205)
第三节 《史记》与中国浪漫主义文学	(213)
第八章 《史记》与辞赋	(217)
第一节 《史记》与屈赋精神实质纵谈	(217)
第二节 司马迁与汉代辞赋家贾谊、司马相如	(233)
第三节 司马迁的辞赋理论与实践	(245)
第九章 《史记》与中国民间文学	(256)

第一节 《史记》向民间学习什么	(256)
第二节 《史记》中的民间歌谣谚语	(260)
第三节 民间文学从《史记》得到什么	(266)
第十章 《史记》——中国文学语言的宝库	(269)
第一节 对先秦语言的总结与发展	(269)
第二节 《史记》的语言成就	(274)
第三节 《史记》是中国文学的语言宝库	(294)
结束语	(296)
附录	(298)
“史记学”史述略	(298)
《史记》在海外的传播与研究	(322)
再版后记	(371)

导论 关于《史记》文学特质的思考

本书主要探讨《史记》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力图将《史记》放到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去认识它的价值,既注意《史记》本身的文学成就,又注意它对前代文学的继承和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对于《史记》文学特质的认识,则是我们探讨它与中国文学关系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第一节 思考《史记》文学特质应

确立的原则

《史记》是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又是璀璨夺目的文学名著。对于《史记》文学的特质进行认识与抉发,有一个历史过程。张大可先生将这个过程概括为四个层次:

最广义的文学性,只着眼于《史记》文章简洁,辞采华美,这是第一层次,魏晋以前最普遍的认识。着眼于《史记》散文的成就和艺术风格美,这是第二层次,唐人深化的认识。《史记》文章结构,转折波澜,人物刻画具有小说因素,这是第三层次,明清评点家多所发抉。全面地、系统地抉发司马迁塑

造历史传记人物典型形象的艺术手法,这是第四层次,可以说是近年来才深入的。^①

并且强调,认识《史记》的文学特性,应注意不同的层次,这个看法是很好的。可永雪先生也曾对古代学者探讨《史记》文学性的过程作过概述^②。笔者以为,在认识《史记》文学特质之前,首先应确立如下几个原则:

一、《史记》的文学特性是建立在历史特性之上的。《史记》首先是历史,但又不同于纯粹的历史资料;作为文学,它又不同于纯文学的虚构,不是为文学而文学。所以,研究《史记》的文学特征时,必须将历史学家的眼光与文学家的眼光结合起来。历史学家通过考证人物事实来研究历史;文学家则主要研究人物形象本身,两者目的不同。但如果抛开《史记》的历史特征,孤立进行文学欣赏,也会失之偏颇。对此,郭双成先生曾指出:

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史记》的人物传记,虽然可以采取不同于前代学者主要是在改错订误方面所用的方法,也不同于历史研究工作者利用《史记》来研究历史,但是如果抛开了《史记》作为一部史书的本质,不联系《史记》一书的其它部分以及另外一些与《史记》有关联的历史著作(这里主要是指《汉书》),而只孤立地对《史记》的人物传记进行研究,抛开

①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② 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稿》第二章第三节,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历史研究工作者对《史记》所记载的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研究,就反而不可能对《史记》人物传记的成就从思想和艺术上作出正确而深刻的评价,而只会陷于皮毛的欣赏和论断了。^①

这个意见是十分中肯的,因为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决定了他的选人标准、选材标准、评价标准乃至感情标准。以选材而言,一个人一生的事迹非常多,选取哪些材料表现人物个性,表面看来是属于文学手段问题,而实质上与作者的历史观有密切联系。作者写项羽,选了“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个大的场面,展现了项羽由兴到亡的全过程,作为文学来说是典型化的手法,但骨子里却渗透着作者的历史思想。因此,研究《史记》时不能脱离历史特性而架空文学特性。

二、应将《史记》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它的文学特性。固然,《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体例是文学性最突出的部分,我们研究《史记》的文学特性,就是以这三部分为基础。但是,为了真正认识《史记》文学特性,还必须结合表、书部分。读《六国年表序》,才能对秦国的历史人物有更深入的了解;读《秦楚之际月表序》,才能对陈涉、项羽、刘邦三人的历史作用有更清楚的认识;读《平准书》,才能更好地理解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对经济问题的看法,等等。即使本纪、世家、列传三体之间,也要整体看待。其一,三体是一个系统,是从人事发展的角度展现历史的变化过程,要了解一个时期的人物或一个人全部,就要在这个系统中查

^① 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